

# 周恩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历史贡献

包天强

(淮阴师范学院 党委办公室, 江苏 淮安 223300)

〔摘要〕 周恩来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与中国革命经济建设实践相结合,形成了丰富而又珍贵的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经济学的系列理论观点,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奠定了重要的理论基础和实践基础。周恩来经济思想宏伟博大,本文仅从周恩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中的社会主义本质论、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基本经济制度理论、分配制度理论、开放发展理论等五个方面做出的历史贡献进行探讨研究。

〔关键词〕 周恩来;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A84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1-8999(2017)01-0084-06

周恩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新中国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是我国国民经济恢复、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重要领导者和组织者,是我国社会主义实施“四个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奠基人之一。他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基本原理与新中国国情和社会生产力状况相结合,并针对苏联政治经济学在理论和实践中存在的种种弊端和惨痛教训,提出并形成了一系列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思想,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和发展做出了积极的贡献。当前我们正处于重要战略机遇期和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新的历史条件下,研究周恩来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实践探索和理论贡献,对于当下更好地遵循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更好地指导我国经济发展

实践,加快推进“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实现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具有现实指导意义。

## 一、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理论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恩格斯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时,认为任何一种社会形态都是分阶段的,他在《哥达纲领批判》中更是明确指出共产主义分为两个发展阶段,“共产主义社会第一个阶段不是在它自身基础上已经发展了的,恰恰相反,是刚刚从资本主义社会中产生出来的。……至于共产主义社会高级阶段,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第一阶段基础上,通过长期的发展才能实现”<sup>〔1〕</sup>。20世纪50年代后期,我们误认为社会主义是由资本

〔收稿日期〕 2016-11-13

〔基金项目〕 本文系2015年江苏省教育厅哲学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2015SJB694)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作者简介〕 包天强(1981-),淮阴师范学院党委办公室讲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发展研究。

主义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一个短暂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在中国的实现并不是很遥远的事情。这种认识上的误区，导致了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正式通过了毛泽东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路线方针，正式拉开了“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这种违背经济发展客观规律、严重破坏社会生产力的运动的帷幕。

周恩来在对社会主义的发展阶段问题上有着深刻而清醒的认识。早在1952年《共同纲领》学习报告会上他就曾指出“中国是一个经济落后的国家，它走向工业国家化、农业集体化的社会主义道路是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的。”<sup>(2)</sup>1953年6月，毛泽东对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总任务进行了表述，即“一化三改”，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完成对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改造（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以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由于社会主义三大改造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顺利地完成了，这让党内的一部分领导产生了当时的中国已经是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国家的错觉。1956年2月，周恩来在全国政协常委会第17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党在过渡时期的两个任务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和实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工业化，这两个过渡任务即使顺利完成了，我们的国家也只是开始进入社会主义，而不是完全建成了的社会主义国家。根据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表述，“建成了的社会主义”不仅仅就是要消灭剥削和贫困，而且“还要消灭愚昧，还要有文化的高潮等”<sup>(3)</sup>。

从上我们可以看出，周恩来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划是分为两个阶段的：第一个阶段，从1953年开始，经过20年左右的时间完成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和社会主义工业化这两个过渡；第二个阶段，就是要在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完成消灭剥削、贫困和愚昧等任务。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推进，到了1956年也就是用了不到三年的时间就基本上完成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这虽然和周恩来当初估计的时间有出入，但他从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出发，指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的改造是顺利完成了，但我们的社会主义发展建设过程中还有很多改造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为社会主义的社会改造是包含整个上层建筑在内的改造，因而当时的任务就是“如何使生产关系更适应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等问题<sup>(4)</sup>。面对“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运动”给我国造成的创伤，使得他对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长期性的认识更加深刻，“如果说我们中国实现现代化需要几十年的时间，那么，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完全建成，就得花更长时间，然后才能向共产主义的高级阶段前进。我们一定要有一个比较长期的想法”<sup>(5)</sup>。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两个时间阶段划分，深刻指出了当时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力落后、商品经济不发达的现实状态，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特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对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的思想进行了补充和细化，深刻阐明了当时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程度和生产关系现实状况，高屋建瓴地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指出了我国的社会主义现在处于并将长期处于初级阶段的历史现实。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征程中，我们始终要基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国情，任何方面的改革发展都要始终立足于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当前我们正处于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关键关口，我们更是要借鉴和学习周恩来的伟大探索和实践经验，牢牢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历史贡献

无产阶级政党在夺取革命胜利建立国家政权后的中心任务是什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指出，就是要“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和“大大提高社会生产力”。周恩来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对于马克思主义的这一基本原理是非常熟悉的。早在1917年，周恩来满怀“邃密群科济世穷”的救国思想，在友人的资助下东渡日本留学，留学期间他被俄国十月革命这一大事件吸引，通过河上肇所办的《社会问题研究》杂志等资料初步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0年10月至1924年7月，周恩来以天津《益世报》驻欧记者的身份在英国、法国进一步探求救国真理。旅欧期间，周恩来考察了资本主义制度、各种社会改良主义和欧洲国家的工人运动，论证了只有科学社会主义（共产主义）才是发展中国的唯一途径。周恩来在《共产主义与中国》一

文中明确指出“社会上的经济制度多是随着生产力发达情况而变迁的。”<sup>(6)</sup>

新中国成立前夕，周恩来在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上，就勉励青年团员们要“搞好生产，发展生产。……一旦全国胜利了，不但工厂、农村、学校、机关要为生产而努力，就是人民解放军，将来也要为生产而努力”<sup>(7)</sup>。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在他担任总理的26年时间里，始终坚持把经济建设放在首位，多次强调生产是新中国发展的基本任务，要不断地提高社会生产力，满足社会的物质文化需要，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1953年9月，周恩来借用毛泽东的著名论断“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军事是政治斗争的最高级最尖锐的形式”，从而得出政治、军事、文化的基础都是经济，也就是经济是基础，其它都是上层建筑，从而更加凸显发展生产、推动经济建设的重要性。1954年9月，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新中国伟大革命的目的进行了阐述，那就是要在不断解放和发展我国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使我国国民经济能够沿着社会主义的道路得到有计划的迅速的发展，以便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sup>(8)</sup>。并在会上首次提出了我国要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指出，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努力发展生产的目的，就“是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sup>(9)</sup>。1956年9月，周恩来在党的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指出，我们建设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任务就是“为了人民群众的福利”。

1957年反右扩大化以后，周恩来依然始终重视着社会主义所需要的物质基础，始终关注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始终坚持把国家的经济建设放在首位。1966年，我国国民经济调整基本完成，正当国家开始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持续长达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开始了。十年浩劫使得我国国民经济发展滞缓，国民经济主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周恩来不计个人荣辱安危，想方设法保护生产，努力维护社会稳定。1975年1月四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忍着病痛向全国人民重申要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目标，激起了广大人民建设社会主义强国的勇气和斗志。1976年10月“文化大革命”结束之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提出的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四

个现代化强国的伟大建设目标，并在全面总结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根本任务的系列主张的基础上，科学地揭示了我国社会主义社会的本质，那就是要不断“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sup>(10)</sup>。2015年10月，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将共享概括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科学回答了当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发展的问题。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形成进程来看，周恩来始终坚持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水平的观点，为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本质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做出了积极的、不朽的贡献；亦或可以这么说，他的观点和主张正是当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发展和完善的逻辑起点和基本遵循。

### 三、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形式是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而发生相应变化的，而生产资料的公有制才是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制度的基础。周恩来对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认识，是在新中国成立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践的基础上不断调整不断完善的过程。周恩来认为，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的构成，既要包括公有制经济的存在，也要包括充当公有制经济有益补充的个体私营经济的存在。周恩来这种在一定范围内允许适当数量的私有经济存在的思想，是符合当时我国的国情、适应当时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正确实现形式。

1953年12月，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认为，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唯一的经济基础就是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由于忽视了当时的基本国情，周恩来当初也并没有认识到这种唯一性的弊端，并且还对此一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实质进行阐述，“什么叫做社会主义？……就是取消了生产资料的私人资本主义所有制，归国家所有了”<sup>(11)</sup>。实践表明，这种单一的所有制模式，对新中国成立初期的国民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做出了不可否认的巨大贡献；但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生产资料改造的顺利完成，当时的社会生产关系也随之发生了巨大变化，再加上当时社会上所出现的“一大二公”现象以及仿照苏联经验所涌现出的种种弊端，使得一贯

坚持实事求是的周恩来，意识到了生产资料所有制单一性的问题所在。他深入调研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和建议，及时地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问题进行了补充和完善，努力使生产关系适应生产力的发展。1956年9月，周恩来在阐述国民经济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指出“今后不论在城市居民区或者广大农村中，都应该保持相当数量的小商小贩，采取合作商店、合作小组、代销、甚至完全自购自销等等方式，更好地为居民服务。”<sup>(12)</sup> 1957年4月，在国务院第44次和第46次会议上，周恩来多次谈到“主流是社会主义，小的给些自由，这样可以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工业、农业、手工业都可以采取这个办法”<sup>(13)</sup>。周恩来这种在一定范围内保持相当数量和给些自由的思想，成功地推动了个体经济、私有经济的存在和发展。

随着个体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社会的实践和发展，周恩来对个人所有制的地位有了进一步的认识，认为个人所有制是对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有益补充。1961年9月，周恩来在和英国军事家蒙哥马利元帅会谈时指出，除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这两种所有制结构以外，我国的所有制结构还应该“有第三种补充性质的个人所有制，如小商小贩或手工业者和个人诊所等”<sup>(14)</sup>。周恩来还对未来社会的基本经济制度进行了大胆设想，认为未来的社会即便是到了今后的共产主义社会，这种不起决定作用的个人所有制都将可能长期存在。1966年5月“文化大革命”开始后，无政府主义思潮对当时的社会经济建设破坏严重，国民经济下滑的趋势明显，面对如此恶劣的政治环境，周恩来始终重视着个体私有经济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中补充作用的发挥，始终竭力维系着中国经济建设的良性发展。他那“允许个体所有制在工农商学中按照百分之几的比例存在和发展”、“私有制经济的存在能够帮助社会主义的发展”的经济思想，是对当时社会主义建设中生产资料所有制结构理论的重要发展和升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邓小平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周恩来经济上搞活的思想，对周恩来关于社会主义所有制模式的思想进行了新的概括和完善，并用制度的形式将其固定下来，逐步消除所有制结构不合理对生产力发展的影响。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对于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有着重要的促进功能，2013年11

月，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更是高度肯定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在整个社会经济建设中的重要性，这使得非公有制经济的权益得到了更加坚强的政治保证。今天，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的创新和完善，汇聚着周恩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带领全国人民伟大实践过程中产生的经济思想和理论。

#### 四、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的历史贡献

马克思主义的分配学说认为，公平的收入分配应该是社会在做了各项必要扣除的前提下，将劳动者贡献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所获得的收益全部分配给劳动者。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的公平分配是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但是，按劳分配绝不是实行平均主义，实行平均分配。马克思指出“一个人在体力或智力上胜过另一个人，因此在同一时间内提供较多的劳动，或者能够劳动较长的时间；……在提供的劳动相同，从而由社会消费基金中分得的份额相同的条件下，某一个人事实上所得比另一个人多些，也就比另一个人富些，如此等等。”<sup>(15)</sup> 周恩来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当时我国的社会实际状况相结合，旗帜鲜明地反对实行平均主义分配，认为平均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的原则是相违背的，实行平均主义的分配方式不利于社会主义建设的健康发展，在社会主义的分配方式上我们必须始终要坚持按劳分配的原则。

新中国成立以后，按劳分配的分配方式也一度被规定为当时的分配原则，但是在具体执行的过程中，按劳分配这一马克思主义分配原则却贯彻得并不彻底。在“大跃进”期间，城市里取消计件工资制和奖金制、农村中人民公社大搞“一平二调”，推行平均主义色彩严重的“供给制”，使得平均主义这一分配方式泛滥成灾，严重妨碍了人们在工作生产中的劳动积极性，严重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也不顾及社会发展客观实际状况，严重违背马克思主义分配理论，提出要把按劳分配这一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作为资产阶级法权加以限制和消除。为此，周恩来多次强调，必须根据“按劳付酬”的原则来给付职工工资，对于从事复杂劳动和简单劳动等不同分类、不同行业、不同工种的劳动者，他们所获得

的工资待遇一定要有所差别，有差别的分配原则才能对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作业务水平和技术水平有着很大的帮助；否则这就是鼓励落后、保护落后，变相地妨碍进步阻碍生产。周恩来不仅对同一地区的分配方式反对平均主义，还对全国不同地区的分配方式也坚决反对实行毫无差别的平均主义。1953年5月，他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针对社会上一些人提出的上海等地工资标准高于其它地区时专门指出，“实际上那里工业发展，技术条件好，生活也高，工资自然也要高些。何必给它们扣个帽子，说很不合理呢？……先进的（地方）就要高些，不能保护落后”<sup>(16)</sup>。可以说，改革开放后邓小平所提出的允许一部分地区、人先富起来的思想，正是周恩来这一主张的延伸和发展。

周恩来在反对平均主义坚持按劳分配这一分配原则的同时，也注意到了收入分配时的公平问题，富有远见地提出要尽量缩小和降低收入之间的差距，避免公职人员之间、工人和农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过于悬殊。1956年6月，周恩来在《工资制度的改革》中对国家机关和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的工资标准提出明确的要求，要求在调整的时候要“采取了中级多增、高级少增或者不增、低级适当增加的原则，以缩小最高级与最低级工资标准之间的差距”<sup>(17)</sup>。1957年9月，他在《关于劳动工资和劳保福利政策的意见》中指出，“我们既要反对脱离农民的城乡生活相差过大，又要反对不合按劳取酬原则的平均主义”<sup>(18)</sup>。2013年2月，国务院出台了指导我国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深化收入分配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进一步优化收入分配结构，增加低收入者收入，调节过高收入，努力形成合理有序的国民收入分配格局，逐步实现共同富裕。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是事关中国社会稳定的全局性的改革，回顾周恩来所坚持和领导实施的收入分配制度，是依照马克思主义收入分配理论的要求，是同当时社会生产力水平相适应的个人消费品的分配原则，是我国当时社会发展实际状况的客观需要。他既反对实行平均主义鼓励适当拉开收入差距，又坚持公平原则不使收入差距相差太大，有力地调动了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实现共同富裕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制度改革必须立足国情、立足当下，充分借鉴周恩来在收入分配机制上的

成功探索和实践经验，紧密围绕共同富裕这一目标，着力解决当下收入分配中的突出问题，努力形成公正合理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分配理论和机制。

## 五、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放发展理论的历史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面对当时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经济形势和社会经济建设的实际状况，周恩来紧密围绕要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国家的宏伟战略目标，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事物普遍联系原理、内外因关系原理等基本原理解，在20世纪50年代就提出了新中国的对外经济关系要建立在平等互利、共同发展的基础上这一指导思想，强调对外经济交往不能绝对“一边倒”，并主张要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开展对外贸易，较早地提出了要采取开放的态度向国外学习的方针，正确地处理了在新中国经济建设中依靠本国经济建设和国外援助两者的关系，为新中国国民经济的快速恢复、生产资料的成功改造和社会主义全面建设的顺利展开做出了卓越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周恩来就一贯主张要正确妥善处理好内外关系问题，强调要坚持以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的指导方针，要通过外交（包括外贸和援外）争取创造一个和平稳定、内外交流、互通有无的国内外环境，以促进我国的经济发展，并尽快地把我国建设成为“四个现代化”的国家。新中国成立前夕，在《关于和平谈判问题的报告》中，周恩来对自力更生和国际援助两者关系就有着完整的论述，“我们要自力更生，然后才能争取外援。外援如有利于中国，当然要，但不能依赖”<sup>(19)</sup>。1956年5月，周恩来在国务院司局长以上干部会议上，提出了学习包括美国、英国等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一切国家的长处的口号。他指出“我们必须把世界上一切好的东西都学来，这样，我们的制度就会更优越。”<sup>(20)</sup>在对待向一切国家学习的具体方法上，周恩来强调不能盲目学习而是要有批判地学习，也就是要学习他们的长处和优点，摒弃他们的缺点和不足；在对于向世界上的日本、英国和美国等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学习的内容上，周恩来也特别指出“除了它们的国家制度我们不学以外，资本主义生产上的好的技术、好的管理方法，我们是可学的。”<sup>(21)</sup>

周恩来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和当时科学技术发展的严峻形势出发，较早地提出了要学习世界上最先进的科学技术上的主张。1956年1月，在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周恩来就科学界的对外关系专门提到“关起门来建设的思想”和“孤立的思想”都是错误的，“科学是无国界的，要进一步密切国际间的科学研究工作的联系和合作，收集和交换国内外科学和技术的资料”，“把我国科学界所最短缺而又是国家建设所最急需的门类尽可能迅速地补足起来”<sup>(22)</sup>。周恩来还对正确处理国际国内这两个市场间的关系，以及对外贸易与国内贸易之间的联系提出了很多具体意见。他对我国在香港的企业提出要“适应那里的环境，……香港可作为我们同国外进行经济联系的基地，可以通过它吸收外资，争取外汇”<sup>(23)</sup>。周恩来多次指示外贸部门，在生产过程中要注重促进国内贸易、国内生产和科研。1960年初，他指示外贸部门建立出口商品生产基地，使得外贸生产基地和生产厂家的生产都有了较快的发展，这样既扩大了对外贸易又大大增加了国内产品的供给，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国内物资供应紧张的局面。

从上可以看出，周恩来在多次讲话中很早就明确使用了“搞活、开放”这两个词语，其中蕴含的“开放”“搞活”的经济思想是显而易见的，是符合当时我国国情和经济建设发展规律

的，遗憾的是由于历史原因周恩来这一主张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很好实施。十年浩劫结束后，邓小平继承和发展了周恩来的“开放”“搞活”的经济思想，他在南方谈话中更是明确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应现代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sup>(24)</sup>2015年12月，习近平同志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上庄重宣示，中国开放的大门永远不会关上。可以说，周恩来的对外开放经济思想，对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对于坚持对外开放这一基本国策，对于新时期继续利用好国际国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和公共产品供给，推进“一带一路”战略，仍然具有着重要的现实指导意义。

周恩来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探索者和成功实践者，对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做出了积极探索和重大历史性贡献。他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伟大事业的坚定信念和不懈追求精神，必将激励和感召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坚定不移地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阔步前进，更加坚定地坚持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和文化自信，更加脚踏实地地为“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而努力奋斗。

#### (参考文献)

- (1) 教育部社会科学研究与思想政治工作组编.《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导读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1. 189.
- (2) [3]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上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246, 544.
- (4) 周恩来年谱 (1949-1976): 中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7. 134.
- (5) [8] [9] [11] 周恩来选集: 下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96, 132, 159, 105.
- (6) 周恩来早期文集 (1912-1924): 下卷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8. 460.
- (7) [12] [13] [17] [18] [22] [23] 周恩来经济文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3. 10-11, 312-313, 350, 275, 376, 238, 352-354.
- (10) [24] 邓小平文选: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373, 373.
- (14) 周恩来传 (1898-1976): 下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2008. 1453.
- (1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3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2. 364.
- (16) 王毅武, 刘同德. 周恩来经济思想研究 (M). 西宁: 青海人民出版社, 1991. 223.
- (19) 周恩来选集: 上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84. 322
- (20) [21] 周恩来外交文选 (M). 北京: 中央文献出版社, 1990. 159, 160

(责任编辑: 大地)